

中国现代哲学史大事记

李振霞 雍桂良主编

红旗出版社

中国现代哲学史大事记

李振霞 雍桂良 范 鹏

毛卫平 孙 琰 管培月

中国现代哲学史大事记

李振霞 雍桂良主编

+

红旗出版社出版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
齐齐哈尔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23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330,000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书号2160·019 定价: 2.40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1、《中国现代哲学史大事记》是中国现代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参考书。

2、《大事记》包括的时间为1919至1949年。“五四”以来，西方各种哲学思潮蜂涌而至，并同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哲学思想发生关系，或者排斥、斗争，或者相互融合，或者兼而有之。鉴于此，《大事记》一方面注意记录西方现代哲学思潮、译著在我国传播的情况，及其不同的遭遇和反响；另一方面也注意记录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研究的著作家们对西方哲学思潮所采取的吸收、排斥或“扬弃”等不同态度，以及在其著作中的反映。本书力求如实地反映三十年间哲学思潮发展的全过程。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过程也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主要内容。“五四”以后，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强大的认识工具和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观察中国和世界并指导中国革命的锐利武器，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激烈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哲学思想，

则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种情况，我们确定大事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主要线索。

4、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出现十多次较大的哲学论战。它是新旧思潮转换时期的重要特征。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斗争。论战各方的著作、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内容。所以，对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论战中各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及重要著作，《大事记》都力求给予介绍。有些并非各方代表人物，甚至也不能称之为哲学家，但其著作中的某些哲学思想比较典型，也一并作了介绍。

5、收入《大事记》中的某些人物的哲学思想，前后变化很大，有的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则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非马克思主义者，以至前后判若二人。本着实事求是、忠于历史的原则，我们把同一人物前后不同观点的著作及其哲学思想，均分别作了介绍。

6、关于本书收录的文章、著作的引文，如原文有明显的错别字、疏漏等，编者均加〔 〕，给以纠正。

7、《大事记》是作为我们所编写的系列书中的一种而出版的。这一系列书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李振霞著）；《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李振霞、管培月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论文选》（李振霞、管培月编）。这些书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8、参加《大事记》编写的有李振霞、雍桂良、范鹏、

毛卫平、孙琰、管培月。由李振霞统改。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以及资料不足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大事记》一定会存在遗漏、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一并提出批评、指正。对于本书中所引资料的作者，以及关心本书出版的编辑人员和中央党校的有关同志，我们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五月

目 录

前言.....	(1)
1919.....	(1)
1920.....	(38)
1921.....	(75)
1922.....	(107)
1923.....	(122)
1924.....	(148)
1925.....	(166)
1926.....	(189)
1927.....	(204)
1928.....	(220)
1929.....	(226)
1930.....	(237)
1931.....	(260)
1932.....	(281)
1933.....	(298)
1934.....	(313)
1935.....	(324)
1936.....	(347)
1937.....	(362)

1938.....	(380)
1939.....	(388)
1940.....	(399)
1941.....	(419)
1942.....	(425)
1943.....	(436)
1944.....	(453)
1945.....	(460)
1946.....	(470)
1947.....	(477)
1948.....	(486)
1949.....	(495)

1919年

1月1日

《新潮》月刊创刊。它是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所编辑的刊物。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及杨振声三人组成。在五四运动前，《新潮》是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刊物，五四以后，宣扬了不少现代资产阶级学说。

1月1日至26日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和《国民》等杂志上发表了《新纪元》、《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北京的“华严”》、《新自杀季节》、《面包问题》、《政客》、《国民仲裁》、《平民仲裁政治》、《过激乎？过情乎？》、《乡愿与大盗》、《放弃特殊地位》等评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1914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1917年俄国革命的血，象一场大洪水，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劳工阶级要联合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资产阶级。在这新世纪的新曙光中，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像，如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将会象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文中还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说它是要把亚细亚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吞独咽的亚细亚。作者号召亚细亚人共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即以民族解放为基础，实现对社会根本改造。日本应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这些文章还对中外社会历史作了简明的分析，着重从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根本

制度上，来观察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指出，中国历史是乡愿和大盗结合的历史。从中外的历史来看，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有其社会制度上的原因。比如，自杀现象较多，反映了社会制度上的缺陷。社会上存在着贵族资本家的独裁统治，什么“国民仲裁”、“平民独裁统治”，在现实中就不可能存在。而且经济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面包问题不解决，换几个内阁，也是要倒台的。真正实现平民政治，就是要泯除一切阶级。攻击进步举动为过激，不过是反映了一种惰性的社会力量在作怪。

1月15日

《新青年》月刊第6卷第1号出版。该杂志1915年9月创刊，初名《青年杂志》，第2卷始改称《新青年》。自第8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休刊，共九卷。本期文章中具有哲学特色的为《恭贺新禧》、《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等。

陈大齐的《恭贺新禧》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面。作者主要论述了：第一，宇宙无始无终。地球在太阳的周围，遵循椭圆的轨道，一刻不停的走。并没有一个起点，非当元旦不可；也没有一个终点，非当除夕不可。不过是人们任意选定一天，当一年的第一日，等地球下次又走到轨道上这一点时，便当做第二年的第一日。就这样，“地球的运行，本来没有始终”。第二，辛亥革命有巨大的反封建的意义，最该恭贺的应当是双十节。“民国前一年的十月

十日不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第一天抬起头来做人的日子吗？我们几十年来的国民，虽然有了人的身体，却没有人的资格。被独夫杀了，还要说：‘臣罪当诛’；被独夫奸淫了，还要说：‘天恩高厚’；被古人闭塞了聪明，还要说：‘道贯古今’。做皇帝的奴隶，做家庭的奴隶，做古人的奴隶，层层奴隶，真是暗无天日。到了民国前一年的十月十日那一天，武昌起了革命，虽没有把层层奴隶完全摆脱了，却因此生出一种觉悟来：从此不做奴隶了，要做人了。”第三，凡事初创的时候，一定不能通行，只要有人提倡，慢慢的风行起来，未尝不可以变成一种习惯。

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面。他为回答社会上对《新青年》的攻击写了这篇文章。文中明确指出，正是因为《新青年》宣传新思潮，拥护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而受到攻击。对于这一点，作者坚定地回答：“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同期发表陈独秀的《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一文，充分反映出作者早期的思想新鲜、活泼，具有辩证法因素。从梁巨川自杀前写的《敬告世人书》中，可以看出梁用对清朝的殉节，提倡纲常名教，妄图以此救济中国社会的堕

落。对此，陈独秀作了辩证的分析：一方面，对于梁先生为殉清而死，表示不赞成；另一方面，又认为，比起那些旧官僚和新官僚来，他有真诚纯洁的精神，不象他们满嘴仁义道德，朝秦暮楚，不讲人格。

1月20日

无政府主义刊物《进化》月刊创刊。1917年前后，在我国陆续出版些无政府主义刊物，其中民声社出版的《民声》、实社出版的《自由录》、平社出版的《太平》、群社出版的《人群》，相继在1918年停刊。1919年1月，上述四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合并成进化社，出版《进化》月刊。该刊共出三期，前两期主要翻译无政府主义文章，第3期是“师复纪念号”。

1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加入该会为该会成员。1918年8月至1919年2月，毛泽东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工作而北上，到达北京后，在李大钊为馆长的北大图书馆任助理管理员，并经常在北大旁听一些课程，听知名人士讲演。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讲，本学会会员三次邀请蔡子民、陶孟和、胡适之先生，在北大文科大楼，以答复问题的形式，谈人生观和各种学术问题。诸如此类的哲学活动，毛泽东都参加了。

2月7日至15日

李大钊在《晨报》、《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战后之世界潮流》、《劳动教育问题》、《战后之妇人问题》等文章，着重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合理的政治统治，以及社会

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烈焰中，突然从俄国冲出了一派社会革命的滚滚潮流，世界上都与这种潮流有脉络相通的关系。劳工们辛苦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这断非民主时代所允许。现代的民主主义的精神，要求人们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为此，需要打破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2月15日

《新青年》第6卷第2号发表陈独秀的《再问〈东方杂志〉记者》。此文揭露东方杂志自称信仰共和，却刊有使共和政体根本动摇的言论，并指出：鼓吹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会使精神界破产，国家灭亡。

胡适的《不朽》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上面。文中引用了范缜的《神灭论》的观点，对宗教的灵魂“不朽”说，即灵魂不死观念进行了批评。同时提出依据实用主义的方法研究有灵论，必然认定灵魂不灭的观念，对人生没有实际的影响，而“三不朽”说，即立德的不朽，立功的不朽，立言的不朽，比灵魂不灭的观念靠得住，比“神不灭说”好得多。文中提出“社会的不朽论”，除谈论社会不朽外，还夸大个人作用，宣称个人的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好坏——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享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椿罪过，也都永远不朽”（本期第102页）。

2月16日至23日

李大钊于《每周评论》和《晨报》发表《祝黎明会》、《黎明日本之曙光》、《秘密外交》、《罪恶之守护者》、《青年与农村》、《死动》、《普通选举》、《光明与黑暗》等文。在这些文章中，提出要实现革命纲领，不要皇帝，不要秘密外交，不要守护罪恶的武装军队。文章极力反对少数“顽冥”者的“死动”，即拜倒在偶像之前鬼混，或倒行逆施地往死路上走。在《青年与农村》中，还特别提出“速向农村去”，要把现代的新文明，输入到社会里面，必须让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在这些文章中，还祝愿中日黎明相映照，加入世界人类的大联合。

2月

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全书十二篇，叙述从老子到韩非的先秦哲学。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整理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定影响。

作者提出自己的哲学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本书“导言”第1页，1930年6月版）。他认为治哲学史的首要任务是“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同上，第2页），务必讲清楚“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同上，第10页）。为此，他进而提出要作一番“述学”的根本功夫，以实现哲学史上“明变”、“求因”、“评判”三个

目的，“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寻出其前因后果，使人都“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本书，第3—4页）。他肯定“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同上，第5页），又主张以西方哲学的体例和模式，来构思和建立中国哲学史体系。

蔡元培在“序言”中指出该书有四个特点，即缜密、严格的证明方法，果断、扼要的研究手段，尊重历史的平等态度，递次演进的系统研究。

1926年，该书以《北京大学丛书》印行。

著

胡适发表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讲演稿收入1921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的《胡适文存》第2卷。

在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中，胡适分别对皮耳士、詹姆斯和杜威的思想作了介绍。

胡适认为，詹姆斯的《实验主义》一书综合了皮耳士、杜威、马赫等人的学说，是“实验主义的总论”，因而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胡适认为詹姆斯讲实验主义有三种含义：第一是一种方法论；第二是一种真理论；第三种是一种实在论。

胡适认为：实验主义的根本方法是“把种种全称名字一个一个的‘现兑’做人生经验，再看这些名字究竟有无意义。所以说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移到效果”（本书第96页）。关于真理论，胡适认为：“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

理’的美名的”（本书第101页）。关于实在论，胡适说：

“实在是一个狠〔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同上，第106页）。

胡适对杜威的“五步”思想论作了专门介绍。他认为“杜威的哲学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同上，第118页）。

4月6日

《每周评论》第16期发表《共产党宣言》摘译。摘译中明确谈到本书要旨是主张阶级斗争，要求各地劳工联合。

4月15日

《新青年》第6卷第4号发表胡适的《实验主义》一文。本文对于实用主义的唯心主义体系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参见本“大事记”第7页）。

梁漱溟给仲甫先生的信，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当时，社会上对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的自杀，有各种议论，一些人还发表了文章。信中针对抽象的谈自杀是否合于伦理等议论，提出对问题要作具体分析，要从变化上看问题。梁漱溟追溯了他父亲的思想变化，并认为其父亲之所以为殉清而自杀，反映了梁巨川的思想变化。附在梁漱溟信后，有胡适的议论。他尖锐地提出：用什么方法才能使

人到老年仍然是进取的，有创造的，即作“白头的 新人物”？胡适开出一个“药方”，名为“精神不老丹”，即“永远可求得新知识新思想的门径”两条：（一）养成一种欢迎新思想的习惯，使新知识、新思潮可以源源进来；（二）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布下新思潮的种子，预备我们到七、八十岁时，也还有许多簇新的知识、思想，可以收获，来做我们的精神培养品。

《新青年》第6卷第4号还以通信形式刊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论战文章，即署名莫等的读者来信：《鬼相与他心通》和王抚五、陈大齐的复信。来信的主要内容为：第一，摄鬼影、念写，反映“人身总有一种微妙物质，可以作用于体外。”第二，鬼相念写“作伪的居其大半……然其中尽有真的。”第三，物质凝集时，才能呈现鬼相。

对于上述观点，王抚五的复信批评说：“此种玄想，在科学上无存在之理由。”他具体分析并指出分子、原子、电子的物质运动，并不能对于鬼相、念写提供任何说明。

陈大齐在复信中谈到，来信者自称为“研究哲学的人”，又承认自己是“逞其玄想”。但是，现在的哲学断不是“逞其玄想”所能造成的。它一定要以严密的科学为根据。“逞其玄想”不但为科学所切忌，也不是现在哲学所欢迎的。

陈独秀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务报告《我们应该怎样？》刊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文中充分反映出，此时陈独秀还不能以唯物史观来观察社会，而是抽象的谈论人性。